



许 明 著

轻拂那 新理性的



——人文研究的思想论集

河南人民出版社

我所认识的许明

许明是我三日不见便翘首以待的最要好的朋友之一。我们之间尽管年龄相差近十岁，但心似同辈，情如手足。维系这种友情的，除一般人品、性格因素，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我们在人生理想、理论识见、学术追求等方面的相通和一致。多年来，我虽精力分散，笔耕不勤，但对他的学术探求十分关注。现在他出版文集，要我作序，自然推辞不得。不过我不是什么名家，要靠我的名字增光添彩，绝无可能。好在这倒无足深憾，因为他的文章本身已相当光彩了。

我初次见到许明这个名字，是在“十年恶梦”醒来之后，一个万物发荣、百花争艳的季节。那是1978年的春天。那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刚从中国科学院独立出来，胡乔木任第一任院长。为了夺回“十年动乱”失去的宝贵时间，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迅速发展，他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其中之一，便是向全国招收研究生。这一年，我正在文学研究所具体负责招生工作。记得当时预定招收22名，结果报名应考者竟达一千三百多人，足见这一措施之深得人心。不过也昭示着考场上将有一场激烈的竞争。许明便是这庞大竞争大军中的一员。从报名材料来看，论学历、资历，许明既非“文革”前毕业的老大学生，又无现实的学术记录，

似乎并无什么优势。但他竟轻松地闯过了“初试”、“复试”、“面试”三大关，还受到了素以治学严谨著称的美学家蔡仪的称赞。我看了他的试卷，听了他的面试，当时的印象是：虽然学养和文字功夫尚有不足，但有思想，有追求，有激情，有自信，是一块好“料”。

录取通知发出后，快要开学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从南通寄来的一封信。拆开一看，是许明爱人写的。信中倍述婚后夫妻两地分居（许原在东北插队，妻子在南通）的艰难，说费尽千般周折，好不容易才将丈夫调回南通，现在板凳还没坐稳，他又要去北京读书，家庭担子再让她一人挑，实在困难，要求组织撤回录取通知。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便抄起信去找导师商议，不料信封内又落出一纸。我急忙打开，原来是许明写的，大意是：另一封信是他妻子写的，她本想偷偷寄出，被他“截获”；他对妻子心情非常理解，但决不因此而放弃学业，因为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他正在做妻子的工作，相信她最终会支持他的，请求组织千万不要为此而撤销录取；最后强调，他是为了表示自己坚定不移的求学决心，才特意把妻子的信一并寄上的。这真是一封不寻常的信，读着它，我仿佛看到，这位执著似牛、意志如钢而又真诚得透明的可爱的青年就站在眼前，不由得从心底涌起一种喜悦之情。从此，我对他有了一种特殊的印象，特殊的感情；虽然还没有面对面地认真交谈，但两颗心已经相识。当我把这封“特殊”的信拿给导师看时，他也深为学生的真诚和决心所感动，认为是收到了一位满意的学生。此后三年，许明以他并不丰厚的功底，依靠顽强的毅力，刻苦攻读，竟对艰涩的康德哲学著作有了自己的理解，完成了毕业论文《康德美论的哲学探讨》，并以优秀成绩获得通过。三年中，我始终负责此届研究生的管理工作，这使我们有更多更深的交往，成为挚友。

1981年，许明获美学硕士学位。此后，他虽一度与妻子一

起调到上海工作，算是建起了一个小家，然而这未能使他消除继续求学深造的精神渴望，相反，这种“渴望”却与日俱增。1986年，他再度进京，回到原导师门下攻读美学博士。现在，他又劝动妻儿，举家北迁，定居京都，决心在学术领地矢志耕耘。这十余年间，无论他在北京还是上海，我们的联系从未中断。通信也好，晤面也好，所谈的唯一主题就是学术。有时讨论一本书，有时研究一篇文章，有时探讨一种倾向，有时反思一段行程，……谈到妙处，思想自由迸射，互相激发，连锁反响，多元辐照，悠悠历史，茫茫宇宙，殷殷情志，漫漫人生，尽入议中，真有身居斗室，心处异境，思接千载，神游玄冥之感，实在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这种灵犀的相通，神智的交会，思想的碰撞，形成强大的“磁场”，有力地吸引着我们，以致刚刚分手，便又渴盼着重新相见。

正是在这种全身心的交往中，我对许明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我认为在思想和学术追求上，他具有三个突出的特征。

首先，是强烈的使命意识和执著的理性追求。

改革开放以来，现实社会的巨大变化，使传统理论面临严峻的挑战，许多重大的实际问题，已无法从其中找到答案。许多人失却精神寄托，陷入理论迷茫，信仰危机。事实上，传统理论不再能承担全能的解释和规范现实的“使命”，它自身已被迫进入“转型期”——它必须实行自我突破，自我更新，在突破和更新中重新建构和肯定自身。从发展的角度看，这是一项相当艰巨然而又不能不完成的历史任务，因为不如此，民族文化将难以承续，国家、民族、人民将深受其害。它需要一代甚至不止一代知识分子的艰苦的无私无畏的创造性劳动。在这项庄严使命面前，知识分子有两种回答，一种是以改革开放的丰富复杂的实践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吸取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传统的和现代的理论与方法，勇敢地在“迷茫”中上下求索，积

极探求传统理论的突破、更新和再生之路；一种是认为既然传统理论已经失灵，那就不必再理会它，让各人操起自己得手的武器，在这“无主”的理论阵地上翻花样，赶时髦，“玩”它个痛快。

许明属于前一种。自报考研究生起，他就决心把学术作为一种使命，一种报效祖国奉献人类的事业来认识和对待。他所要求于自己的，不止是一般地掌握前人已经建立的有价值的理论知识，而是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增添自己的新发现，新建构。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理论品格。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对于认知“转型期”的迷茫、困惑、机遇，感受特别深切，既有责任的激扬，又有精神的痛苦，既有求索的冲动与喜悦，又充满着焦灼和不安，既深怀发现和创造的自信，又倍觉举步之维艰；对于那种自己远离“使命”而又振振有词鼓动他人也效法“逃离”的学者、言论，他难以赞同，起而反驳，或登台论辩，或著文争鸣；对于自己和同辈的学术历程，时常进行严肃冷静的反思。他认为，同辈学人中虽然一时出了不少“名人”，但“就学术的根基而言，他们是无根的。既少西学的根，也少中学的根，更少马列的根。所以，他们（我们）思想大于文字，见地大于学养。”（《规范与学统——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反思》，载上海市委党校《文献情报》92年第6期）应当说这是一个虽然有些过于严厉但却一语中的的相当清醒的认识。当今不少很有才气的青年学者，常常过于自尊自负，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对自己的学术思想、学术道路进行认真地反思，结果将难得的才气耗费在一些不太重要的课题上。借此我要对这些朋友进一言：须知才气（尤其是大才气）并不是人人都具备的，“天生我才”，亦当运我才以尽“天职”，把目光凝聚到全民族乃至全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视野、大目标上。而在这一点上，许明是怀有自觉的。他所追求的，是思想家型的学者之路。尽管也有困惑，有矛盾，有痛苦，他能面对挑战，奋勇求索，始终坚定地把研究的目标对准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在理论

“无根”、“失重”的年代，面对“乱哄哄”的学术舞台，他大声呼唤“前沿意识”、“理性意识”，渴望“轻拂那新理性的风”，并对“转型期”民族文化发展的路向有了初步的思考。他认为，由于当下中国文化“是中学、西学、马列‘三分天下’的文化”，因此它的未来将是这三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机的结合”。无疑，这是一个颇有见地、启人思考的见识。这里，我想沿着他的思路作一点补充。我认为，所谓三者“有机结合”，并非等量交溶，而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母体，以它的现代化为归宿，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只是实现这种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文化滋养和理论指导。任何具有悠久传统的民族文化，都是一种独立的生命系统。它的发展和演变，都只能是这种生命结构本身与外部环境（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理论的）互相顺应和同化，以及在顺应、同化中重新建构、自我转化的结果。如果在发展中失却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也许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会存在的，但那决不是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因此需要强调和突出传统文化自身生命机制在民族文化现代化中的决定作用。自然，时至今日，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中国又是一个开放的中国，即使未来我国传统文化完成了向现代化的“转型”，它也只能是现代文化的主体、主流，而不可能成为唯一的文化。在任何一个开放的国度，文化的多元化如同世界的多元化一样，将是一种十分正常的现象。

许明的思想信仰和学术追求，是真诚的，也是执著的。他决心“不在乎别人如何评价，去完成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生命追求”。我觉得这是他生命中最富活力，至可宝贵的东西。这种顽强的生命追求，令他知艰难而务进，劈纷乱以守静，超然物外，聚精会神，思如泉涌，既是动力之本，又是智慧之源。这或许是他得以成功的一个基本原因。

其次，他十分重视思维变革。这也是我们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

我注意这个问题是在 1984 年前后。那时我正主持文学所科研处的工作。当我把目光投向研究过程的时候，发现学术界那些平庸文章背后，是作者平庸的思想，而平庸的思想又同简单机械的思维模式直接相关。我感到要求得思想的解放、学术的进步，必须从变革思维模式、改进研究方法入手。于是开始研读有关科学史和方法论的论著，探讨科学发现的深层秘密，并发表了《必须重视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研究方法也需要开放》等文。许明作为一名开拓型创造型的青年学者，对这一问题也十分敏感。自 1986 年起，思维变革和研究方法，就成为我们经常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

我们认为，一部科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人类思维沿革史。对于一种文化理论现象进行探求，不深入到思维层次，很难准确把握其精髓；同样，一种重大理论的发现和提出，一种新文化的创生，也必须以对传统思维模式的更新变革为前提，不然即使面对新事物，也会坚守老观念，把新的理论生命扼杀于摇篮。而现实是，多年来由于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影响，我国学术界，尤其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界，就大多数人来讲，已形成一种共同的思维模式。这种单一的思维模式，造成千部一腔，百家一言，思想僵化，学而无术，成为科学发展的一大障碍。我们深感，唤起学界对思维变革问题的自觉，推进思维变革的开展，是解放科研生产力，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一项迫切任务。

许明作为一个富于使命感的学者，对此花费了很多的心血。他一面仔细研读西方自培根、笛卡儿，直至胡塞尔、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的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著述，探寻其思维变革的过程，并努力从哲学层次上予以把握；一面又对我国近现代知识分子这一认识主体的特殊状况进行梳理、分析，寻找其症结所在；在此基础上，为促进文学研究思维方式的变革，提出三个关键环节，即：认识理论，要变“经验归纳型”为“科学发现型”；构建理

论，要树立“模型”意识；研究理论，要加强“精细的”语言分析。我以为这是很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见解。当然，这也是我们的共识。

在自己探讨的同时，许明还积极关注学术领域的实际变化。当看到栾勋《现象环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这篇在他看来是“提出了美学史上中国式的思维结构模式”的论文时，他激动的同我讨论了整整一个晚上。我们认为，此文由中国古代美学庞杂的表象出发，直接潜入思维模式的深层，揭示出古人审美思维结构的秘密，再反过来，顺藤摸瓜，找出其各种散乱的理论的内在联系和运动过程，触及了决定中国美学思想生命的最核心部分，从而把我国美学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之后，由他执笔写了《叩响紧闭的思维之门》一文，予以评说。他希望以此有力的事实向学界告知：变革思维模式对于提高学术质量，推进科学发展，是何等重要。

如果说，对于研究方法、思维方式是否具有自觉意识，是衡量一个理论工作者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那么可以说许明已经具备了这个条件。

其三，他富于创造精神和建设意识。

许明在《自序》中称自己“天性中有好斗好胜的成份”。确实如此。在学术上，他勤奋好学，广搜博采，但从不安分，从不墨守成规，从不盲目崇拜名人。他要求自己，不是简单地从既成学理中“拿来”什么，而是“拿来”之后，如何以自己的心智创造性地“转化”、“整合”，从而对学术的发展“贡献”出什么。他的信条是：“活着就要做点什么。”为此，他的学术心态，总是处于创造的渴望和激动之中。他常常为发现一个有意义的课题，形成一个理想的构思，突来一种神思妙悟，兴奋地彻夜难眠。在这种难以抑止的兴奋中，他便会不由自主地“闯”进我家，一“侃”就是半天。这种近似“迷狂态”的“神侃”，造成一种独特、诱人的精神氛围，

令我深受感染，不知不觉也“同侃”起来。有时候，他同一群青年朋友“神侃”、“争鸣”，往往废寝忘餐，从日落一直闹到日出。我理解，他是在寻求思想的碰撞，智慧的激发，精神的交流，也是在检验和推敲自己的理论识见。

经过十多年，尤其是近六七年的学习、思考、转化、整合，许明的学术思想逐渐成熟，在理论建设中开始形成独具个性的系列成果。作为这种“个性”的代表性著作，是《美的认识活动》（1986年出版）和《美的认知结构》（即将出版）。《美的认知活动》由“环状结构”的新思维出发，突破传统美学观念，把“审美活动”定为美学研究的对象和逻辑起点，以对审美活动各个环节的研究，构建美学基本理论的新框架，其中包括“美的客体论”、“审美中介论”、“审美活动本质论”等。该书由于富有创见而被收入《中国当代学术名著大词典》。《美的认知结构》是他的博士论文，更是一部用心的力作。他自己将此书看作是“建立工作的思维模式的一个尝试”，是“一个建设新理性的奉献”。这部书，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为指导，以人类文化大背景为依托，以审美活动为中心，广泛吸取现代多种学科的新思想新方法，对审美活动中的主体——客体的审美认知过程，思维秘密，进行精细的探索，提出了独立的系统的新见解，把传统的美学研究向更深的层次推进一步。它既是我国美学研究的一颗硕果，也是作者对自己提倡的思维变革的一次有意义的实践。我相信，这部书在中国美学史上将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同时它也具有同世界同类著作对话的资格，将为祖国的学术赢得一份骄傲。两本书之后，许明还发表了数十篇具有一定理论新意的论文。这些论文的光亮，大多与两本书的核心思想同源，它们共同构成到目前为止许明学术探求的整体面貌。理论研究贵在创新。从创新的角度看，许明的这些论著已是很不容易的奉献了。

如果说一下总体印象，我认为许明是我国当今中青年学者中

很有希望的一位。他具有聪慧的天资，勤奋的干劲，良好的学养（包括比较完整的多元知识结构），理性（包括理论、方法、目的）的自觉，又比较谦和忠厚，这一切将是他取得进一步成功的坚实基础。自然，他不是完人，也有自己的弱点与不足。在我看来，主要是两点：（一）在学养上还要更注意加强国学的根底，更熟习民族的传统文化，这样，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好，其他学派的转化整合也好，才可能有强健的主体，才能保障理论的创建沿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方向进行；（二）在写作上，一泻千里，一气呵成，固然涌动着激情，飞扬着灵气，显示出一种气势，但粗放之处也便在所难免。我以为，文章还是千锤百炼的好。布局谋篇，遣词造句，均须从严对待；关键之处，反复推敲，要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倘使将激情、灵气同严谨凝炼更好地结合起来，不是可以令著述的品位更上一层楼吗？这是我做为朋友的更高要求和真诚期望。

以上所述，表达了我对许明为学为文为人的基本看法。我非常欣赏他在思想、学术上执著追求、开拓创新和积极奉献的精神。他的这种思想品格，都明显地体现在这本论文集中。所以，我想以此文为序，还是离题不远的。

1992.国庆前夕

北京 成寿寺

老生常谈勿当序

对 我来说，为许明的文章作序，真是力不从心。我的研究范围很窄，只局限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史的某些方面；对于外国的东西，由于知识不足，从不敢轻易发言；对于国内当代美学问题，自知思虑不周，只好退避三舍。许明著述涉足甚广，中外古今常发深思。假如把他比作一个足球运动员，那么他既可以在中场组织全队进攻，也可以作为前锋独自带球突进，还可以充当后卫拒敌于国门之外。他是个难得的“满场飞”。为别人作序，“坐井观天”不行，平行讨论也不行，譬如兵家作战，最好居高临下，方能势如破竹。我感到“力不从心”，就是因为做不到“居高临下”。但是我比他年长，凭着这点优势，很愿意在尊重知识、爱护人才方面说几句自己想说的话。不过所说多为老生常谈，故题曰：“老生常谈勿当序。”

许明的美学研究是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开始的，围绕康德，他读了许多与课题有关的西方哲学、美学方面的书籍。经过一段时间的搏斗，他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人们期待着他在西方美学史研究方面能够有更多的建树。然而许明是一匹野马，个别的地域范围不了他，仿佛只有整个人类世界才是他的真正的家园。在西方的科学主义原野上奔驰了一阵以后，他又回到了东方，回

到了古老人文主义的中华大地。在这里，他面对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不断振鬣长嘶。他读了不少中国古代哲学方面的书籍，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中国古代美学史专业同样挽留不了他。他的科学研究精神的兴奋中心始终是在世界的当代。浏览一下他的著作目录便可明了这一点。

我带着感情叙述许明十几年来所走过的道路，目的不是为了特殊性的许明，而是为了由此引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老生常谈：读书与养气。

科学研究必须多读书。读书的过程，既是取得概念、积累知识的过程，又是突破概念、扬弃知识的过程。前者在于破我之“愚”，后者在于破我之“迂”。一个愚昧无知的人，绝不能从事科学研究；具备一定的知识，但所积累的数量倘不足以引起质变，科学研究也难以取得象样的成果。所以必须多读书——取得概念、充分积累知识，以便从愚昧状态中解放出来。这是科学研究的第一步，我称之为“一破”。但是读书很多、知识丰富的人就一定在科学研究上作出闪光的贡献吗？我看未必。因为知识对于人具有两重性：它既可以破我之“愚”，也可以成我之“迂”。“迂”和“愚”一样，也是科学工作者精神世界内部的障碍，必须用力加以排除。破愚主要依靠多读，破迂则主要依靠多思。多思可以防止食古不化，可以使人从教条主义的困惑中解放出来。这是科学研究的第二步，我称之为“二破”。一破为学，二破为思，学和思相辅相成，比之谓“两破”。它是人之创造力得以发挥的必备前提。杜甫有佳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世人不察，常将句中的“破”字仅仅理解为“一破”；历代注家未及深思，历千余年而未见纠谬者。在我看来，“破”字当解为两破：经过两破必有长进，不经两破罕有所成。无论对于文艺创作，还是对于科学研究，道理都是一样。杜甫的成就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一破可以获得知识，二破可以锻炼思维，两破方能成就人

才。知识和思维能力是科学工作者的两翼。两翼强劲有力，不仅可望成为学问家，而且可望进一步成为思想家。对此，一位西方哲人说得好：哲学的思维比哲学本身更为重要。两破是培养科学研究能力的必经之路，而要使两破之后的能力在实践中焕发出应有的光华，那就必须养气。养气，就是涵养正气，涤除邪气；就是开拓胸襟、放开眼界；就是关心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就是培养自己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不为—己的私利所动，不为—时的邪气所侵。只有光明正大的心灵才是真正自由解放的心灵。所谓良知良能只会存在于真正的自由解放的心灵之中。“大块噫气，其名为风”。两翼乘风，必能扶摇而上。文章是心灵的呈现。一腔正气驱遣着两破之后的能力，定会写出创造性的大块文章。

对于一个文化人来说，读书与养气，二者不可缺一。历史上的“五经博士”，多半是有知识而缺少正气，读书不少而缺乏创见，病根在于他们把读书识字当作今人单纯的进身手段。他们的头脑只配作古圣先贤的跑马场，没有养成自由解放的心灵，失却了良知，多半沦为禄蠹，而很难成为精英。社会主义建设不需要“五经博士”，而迫切需要开拓型的人才。

许明是个开放性的人物。他工作勤奋，胸襟开阔，思维敏捷，对于生活富有激情，有人气而无鬼气。尽管他并非完人，却不妨引为知己。我在为人处世方面很不随和，对于人不厌倾心吐胆，对于鬼则常掩鼻而过之；当然，从不听鬼话，却十分爱读人文。

上面所说的话都是老生常谈，有新感慨而无新见识，当作序言不够格，故题曰：“老生常谈勿当序。”

1992年11月，京郊鲁谷

自序

我的求索之路

—

1949年农历九月初一，我出生在苏南太湖边上的一个小镇——光福。光福，光天福地，相传汉司徒邓尉在此养老，亲手栽植松柏四棵，两千余年，这四棵松柏在自然力的作用下，变成“青、奇、古、怪”四绝，乾隆御题，声名遐尔，连同司徒庙、香雪海、西淹湖……等风景名胜，光福镇历来被文人墨客瞩目。小镇读书风气甚浓，不到万人的这样一个地方，人才辈出。有清一代，有官至太子太傅的，到了现在，上大学而成为各路英豪的，数不胜数。我就是在这样一个人文传统很浓厚的景色优美的环境里长大的。我的性格里的理想主义色彩，细想起来，大概与这从小生长的环境有关吧！那湖光山色，那诗画一般的绿野和山丘，以及那代代相传的民风民俗，使你容易沉醉和遐想。对我来讲，生活的美好比生活的丑恶更真实，迄今为止，我也一直在寻找这种真实，就象要在生活中印证那色彩斑斓的童年的回忆那样。

我十二岁到上海读书，一直到“文革”高中毕业。“文革”已有历史结论，但我个人形成浓厚的理论兴趣，从某种意义上讲还要

感谢“文革”。老高一的学生，不过十六、七岁，但当时却少年老成，以天下为己任，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理想。在那些无所事事，停课——复课——停课的日子里，与一班志同道合的青年理想主义者，发愤苦读。现在那些迷恋电子游戏与卡拉OK的青年肯定不会理解，我们那豆蔻年华是在挑灯夜读的日子里渡过的。除了读马列的一些基本著作外（当时读了《工资、价格和利润》、《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法兰西内战》、《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联共（布）党史》等），还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其他历史和哲学著作。当时西方文学著作遭禁，但我们这些最革命的“红卫兵”，仍然偷偷地用各种办法弄到。《红与黑》、《父与子》、《双城记》，甚至解放前的版本《基督山恩仇记》。如此的读书热情，都是被理想主义的圣火点燃起来的。

下乡在东北边陲的小山村里，无书可读。很巧，1970年左右出版了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于是，我拿了挣工分所得的十几块钱，步行几十里，在县城的新华书店买到了它。它一直伴随我进入研究生学习。我的理论写作的基本训练，就是在高中以及下乡这段时间里，在作大量笔记时形成的。那时，我自己还谈不上有什么独立的理论思考，我们（有一些脚踩泥巴的读书同学）所谈论的，不过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农村所有制的改造”等，话题很大，内容贫乏，超不出当时报纸上的讨论范围。1970年——1972年，我在吉林师大中文系（现为东北师大）学习。应当说我很幸运地在20岁的时候有了这样一个进大学门的机会。虽然当时的大学被工军宣队管理，但毕竟图书馆还在，老师们还在。东北师大中文系是很好的系，师资强，传统好，我结交了许多老师辈的朋友，这阶段，读书很多，如五卷本的哲学史（敦尼克著）以及大量著作原著的中译本，但师道风范对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更大。

大学毕业后一直到1978年考研究生，我在一个工厂的子弟中学当教师。这几年，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发展到了极困难的时候，风云多变，个人命运无法把握。我在当时这样毫无希望的环境下，竟坚持自学了五年，几乎天天夜读到凌晨，天天练笔，想来也有些后怕，是信念？是希望？还是惯性？不知道，只知道当时宁肯啃窝窝头，也要省下细粮票与别人换书看。莎士比亚全集，鲁迅全集，以及苏俄一大批作家的杰作，都是在那个时候读的，其间我最高的成就，是在1975年发表了一篇小说，《吉林日报》用几乎一版的篇幅刊登的。

但我深知自己不是搞创作的料，满脑子都是思虑，时时在想，而不是在感受。我想当理论家，当时只是空想而已。一晃28岁了，1978年给了我一个转机。我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首届研究生，这应诺了一句民谚：机会只给有准备的头脑。

二

我的导师蔡仪是一位十分严谨的哲学素养深厚的学者。在硕士生与博士生期间，他的严格指导使我终生受益。现在我更领悟了，为什么老专家可贵。因为象蔡先生这样在20、30年代步入文化学术界的学者，他们的经历就是学统本身。他们的眼光，方法，看问题的角度，都有上下承受的直接性，所以，作学生的就容易上正规，上路。这是经验之谈，悟出这一点，也实属不易。

自1981年起，我开始发表学术论文，一直到现在，完成了专著两部，论文七十多篇，都是美学以及相关文艺学的基本理论的。编入这本集子的，是我挑选出来的一部分，大约为论文的一半。

1985年以前，我的论文主要围绕美学基本问题写作的。当

时美学界在社会开放的大潮冲击下，空前活跃。50、60年代的基本问题，在新的层次上又翻了出来。1980年左右，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成了美学界的热门话题。蔡先生指导我们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关于《手稿》的。我的论文题为《论异化与自然的人化》，一万五千字，洋洋大观。我从自己对《手稿》的仔细阅读中获得的见解至今未改。《手稿》确实是马克思的一部早年的有过渡性质的著作，把它拔高成经典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是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的。其后，我又写了一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如《人的物质生产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结构的历史的人学与萨特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等。时隔将近十年，所有这些观点我都没有大的变化。因为这是比较认真地研究了原著以后写出的论文。马克思的所有这些基本论点，不象有的人所想象的那样，成为僵化、凝固的代名词。相反，它们引导出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当然，而且必然成为我们开放改革的理论动力。但是，在当时“反传统”的狂热下，否定以往的，才是合理的。这种历史的暂时的合理性使人们厌倦一切说教以及与说教有关的名词概念。而真正热门的理论，在80年代初，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法兰克福学派、南斯拉夫实践派、卢卡契、葛兰西等；实践、实践本体、人化的自然、异化……等等。这是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由于多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倾向，使得原本生机勃勃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仿佛与开放改革的大好形势大相径庭，而改革，却要从别的思想家的武库中选取武器，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一个悖论，一个留下深远历史影响的悖论，使中国的改革的马克思主义者吃苦头的悖论，这个悖论造成的历史性后果，要到80年代末期才能充分显示出来。

80年代初期的另一组论文是关于康德美学的，这是我的硕士学位论文。这组论文约十万余字。以《康德美论的哲学探讨》